

少华◎著

红四方面军

第一次全面还原牺牲、苦难、英勇的红四方面军

HONGSI
FANGMIANJUN

下 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少华◎著

红四方面军

第一次全面还原血性、苦难、英勇的红四方面军

HONGSI
FANGMIANJUN

下 册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四方面军：全2册 / 少华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6（红色
智库）

ISBN 978-7-5561-0413-0

I. ①红… II. ①少… III. ①红四方面军—史料 IV. 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8717号

红四方面军

著 者 少 华
策 划 李蔚然
责任编辑 李蔚然
装帧设计 谢俊平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56.5
字 数 10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413-0
定 价 108.00元（全2册）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第十九章 嘉陵江畔

惨胜的代价是十室九空、兵源枯竭、瘟疫肆虐、军民争食。张国焘把川陕苏区喻为挤干了汁的“柠檬”，心生嫌弃。徐向前提出傍着老区发展新区的战略，他的川陕甘计划与后来毛泽东北上计划如出一辙。

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犹如绚丽的晚霞。当军民们陶醉在漫天霞光之中时，站在高处的人能看到如火如荼的云朵下潜伏着沉沉暮霭。

1934年11月，徐向前从前线赶回后方毛裕镇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简称政工会议）。沿途所见，令他心情沉重：大巴山下，良田撂荒，人烟稀少。新冢满目，哀鸿遍野。他在一次采访中列举了苏区面临的粮食、兵源、物资、疫病4种困难：

党政军机关全力以赴，投入医治战争创伤的中心工作中去。可是，对于一个元气伤害过重的躯体来说，短时间内，想起回春之效，谈何容易？

人民对土地的热情降低了。一则是粮荒严重，许多地方连种子也没有。二则认为种下去也难保收成，“围剿”一来，又会落入敌人手里。三则劳力十分缺乏。

兵源枯竭了。根据地的青壮年，早已大批参加红军。战争中遭敌侵占的地区，又被抓走或杀害了一批。还有些人受反动宣传影响，逃往敌占区去。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物资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伙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

随着饥饿现象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流行，夺去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使我们眼下艰窘万分，渡过翌年的春荒，应付敌人新的“围剿”更成问题。

11月初，全军政工会议在通江毛裕镇召开。张国焘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当前的政治任务是：全力巩固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果实，在继续坚决进攻中准备应付更大更残酷的战争，冲破“川陕会剿”。

尽管张国焘把“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的口号高唱入云，但内心却非常暗淡。他也看到了隐藏在大捷后面的阴影：

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发展是不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枪支弹药，素质愈来愈低，总数虽在五万左右，但实际作战的枪支不到两万，其中多数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货色，而且枪支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都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①

红四方面军中，不仅是总部首长心有隐忧，军师一级干部也为根据地难以解决的困难而焦虑。王宏坤回忆说：

当时，最大的困难还是缺粮。在往年一年中的九十月份是秋收的季节，可是今年因为春夏的播种时节处于敌人六路围攻的紧张阶段，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群众大部跑掉或者躲藏起来，田地都荒芜了，胜利后，我们虽然恢复了根据地，但这时却没有收获。许多人在挨饿，红军也一样，特别是四军防区最严重。

与粮荒同样严重的是疫病。疫病之中，传染性最强、发病速度最快、死亡率最高的是霍乱，即川民所称的“人瘟”。

霍乱最早是从刘湘的第五路军开始的。

第五路军以梁山为后方，为保证前线战情需要，刘湘强抓8万名挑夫，维持运输线。这些挑夫多数是强拉来的瘾君子，沿途死亡者，不计其数。五路军行军路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99页。

线，从梁山、绥定到宣汉、万源。死亡挑夫、士兵的尸体没有及时掩埋、消毒，沿途到处都是被遗弃的伤病员，他们得不到及时救治，也没有机构予以收留，任其自生自灭，结果导致霍乱猖獗，病毒沿白区向交战区蔓延。防御区域最大的红四军首当其冲，几天之内，从军到连的卫生所全部住满重病员。这种病从被感染到发病、死亡，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军长王宏坤也被击倒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发病的过程：“当时，我们军部住在镇龙观西南面的一个村庄里，司令部住在旁边的一座庙里。一天早饭后，我到司令部，刚一坐下，突然身上不停地颤抖，感觉浑身冰凉，接着就是连续不断地拉肚子，到午饭后即不省人事。”

根据地动用所有的力量防止霍乱。好容易制住了霍乱，更大规模的伤寒、痢疾又接踵而来。

在战乱、粮荒和瘟疫的夹击下，根据地出现人口锐减的现象，徐向前、张国焘等人在回忆录中不约而同地用“十室九空”来形容。

作为根据地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萌生了苏区不可死守的想法。在毛裕镇政工会议期间，他愁眉苦脸地来找徐向前：“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都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打法？昌浩同志说去汉中，行不行？”

徐向前察觉到他和陈昌浩都有另起炉灶的想法，明确地表示：“汉中去不得。那里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

张国焘拖长腔调问：“如何依托老区向外发展？”

徐向前旧议重提：“两个月前，在东线追击的时候，我与李先念同志提出过跨江发展的方案，你没有同意。”

他指的是1934年9月中旬的事情。

那时，徐向前、李先念率领部队追击田颂尧的第二路军进至苍溪，直逼嘉陵江边。两人商议，派一个师打过江去，在对岸的南部县开辟一块地盘。

沉默寡言的徐向前遇到李先念，话特别多。老红军宋承志认为在红四方面军中，徐帅与李先念关系最融洽：“先念同志对徐帅格外尊重，敬若师长。徐帅的每一次战役战斗部署，他都悉心研究；徐帅的每个战略决策，他都要细心揣摩，结合实践，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他还经常向徐帅请教，谈兵书战策，谈敌情我情，谈作战构想。徐帅称赞他是肯钻研、善动脑、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将领。”^①

徐向前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忧虑：“川陕根据地经历了反‘三路围剿’和反‘六路围剿’两次拉锯。红军打下去，收回来，又打下去，又收回来。战争的破坏

^①宋承志：《一代伟人，万世流芳》，《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46页。

很厉害，加上‘左’的政策的影响，弄得经济困难、兵员枯竭，民穷财尽，如果不早谋出路、开辟新区，将来国民党如果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围剿’，我们可能很难应付。”

李先念赞成打过嘉陵江去的想法：“嘉陵江对岸的南部县，过去发生过农民暴动，有群众基础，驻守在那里的是田颂尧部队，这龟儿子已经被我们打怕了，只要有一个师过去就能打开局面。”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就是如果部队能够在苍溪和南部（县）站稳脚跟，下一步最好沿江向北发展，打击胡宗南部，把川甘边搞到手，与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

“那就更好了，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到手，我们就可以向北打开局面了。”

两人兴致勃勃，谈到深夜。

第二天，红三十军抽调一个师，沿岸收集了几十条民船，选好渡口，准备过江。

张国焘打来电话，表示不同意。

徐向前据理力争：“派少部兵力过江，形成夹江发展的局面，无论是对苏区今后的发展，还是应付眼前的困难，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好事情。”

“部队不能过江。”张国焘解释理由，“根据情报，在苏区的东南方向，刘湘的部队有向江口进攻的企图，现在兵力紧张。”

“不是派大部队过江，而是去个把师。”徐向前试图打消他的顾虑，“两边活动总比局促一边回旋余地大吧。如果真感觉东面力量不够，可以把东面防线收一收。”

张国焘态度很坚决，反对过江。

徐向前很恼火，也不好继续争执下去。他认定张国焘的阻止是重大失策：“后来，红四方面军还得过嘉陵江发展。特别是第一次过江没有成功，我真是恼火。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我和先念的主张比较好。趁敌人溃乱之际，派一部兵力打过江去，追一追，打一打，把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搞块天下。万一不行，还可以退回来。当时没有乘胜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确实是战略上的失策。”

听到徐向前旧事重提，张国焘搪塞道：“你原来傍着老区开辟新区的思路是对的，只是当时敌情不容许。现在时机成熟了，能否再过江？”

徐向前摇摇头：“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敌人已经沿江广筑碉堡，再向南部县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还是选择其他方向吧。”

张国焘不置可否，吩咐徐向前先拿出一个可行性方案，供将来开会讨论。

毛裕镇政工会议规模很大，连以上单位均派代表出席，代表总数达到800人。会上由张国焘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陈昌浩作党政工作报告，徐向前作军事工作报告。这是一次着重从政治上建军的重要会议，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会议系统地总结了红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经验，通过了《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案》，制定了《红四方面军军训》《军、师政治部暂行工作细则》《团政治处暂行工作细则》，对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地位、作用，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会议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精神总结为“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十六字军训，精练传神。陈昌浩是上述决议的主要起草者，为推进全军政治思想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警卫员康海生回忆：“昌浩同志为健全部队的政治工作制度，为红军的党团建设，付出了一定的心血”，“他工作认真负责，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晚上都是很晚才睡觉（晚饭后，我烧二三次开水，才能让他喝到休息），早晨起得很早，开饭时，我把饭端来，经常是放凉了，再回去热，有时往返几次。”^①

另一方面，会议系统总结了入川以来，特别是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多次战役证明，川敌对付红军采取堡垒主义，其战略战术是：进攻时多守堡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防御时梯次配置，固守堡垒，经济封锁，反动游击。只要根据地存在一天，敌人就会反复“围剿”，“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则是长期的。红军应对川敌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收紧阵地，待机反攻，重点突破，并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进攻。在战术上，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击敌一路，纵深迂回，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以近战夜袭的特长打破敌人的防御，以广泛的群众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

毛裕镇会议上，还表彰了功绩突出的部队，授予九军七十三团“攻如猛虎”、七十五团“守如泰山”奖旗，授予三十军二六三团“钢军”、二六五团“夜老虎”奖旗，授予三十一军二七四团“夜袭常胜军”奖旗，授予三十三军二九六团“百发百中”的奖旗……在表彰中，防御面积最广的第四军获得的表彰、奖励最多，张国焘、陈昌浩总结第四军的经验最多，有些话说得不合适，也引起了其他部队的异议。有部队反映：“把四军提到天上，将其他军压在地上”^②。

毛裕镇党政会议之后，总部留下师以上和部分团级干部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

①范青、陈辉汉：《陈昌浩革命生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第174—175页。

②《红四方面军发展简史资料》，《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长编》第294页。

事会议，讨论红军和根据地今后的发展方向。

会场设在一所小学校里。

张国焘开场白很简短：“同志们，毛裕镇会议已经确定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是粉碎敌人‘川陕会剿’，我们留下来继续开会，是为了研究粉碎敌人‘川陕会剿’的具体方针和策略。这个主题扩展一点说，是研究红军和根据地向何处去的战略问题。请向前同志先说。”

徐向前字斟句酌：“国焘同志要我提方案。我对着地图想了一两天，有了个初步的设想，交大家讨论。再强调一下，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修改，可以推倒重来。”

他语速很慢，看得出很慎重，有顾虑。

参加会议的干部催促道：“总指挥快说吧。”

徐向前说：“川陕根据地今后如何巩固？红四方面军今后如何发展？我们应当有个整体的明确的战略蓝图。我思考的结论是三句话：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开辟新区，就是以现有的川陕老区为基础，重点向甘肃南部发展，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

方案引起强烈反响，有的点头，有的摇头，更多的是疑惑：

“不是赤化全川吗？应该向南呀，怎么调头向北了？”

“天水一带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队，先打强敌？红军的战术不是强调避强击弱吗？”

“是的，向甘南发展，我们的打击目标就是胡宗南。”徐向前接过话头，陈述了三条理由：

第一，盘踞甘南和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也是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则敬而远之。红军集中力量打击胡宗南，他们有可能按兵不动，作壁上观。

第二，碧口和文、武、成、康地区，位于汉水与白龙江流域，临山傍水，人口不少，利于我军解决物资和兵员补充问题，摆脱目前的困境。

第三，依托老区，进取甘南，比较稳妥可靠。我军进退自如，有回旋的余地，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徐向前用自信的语气说：“从各方面的情况看，这个川陕甘计划是能够实现的。”

李先念率先表态支持：“我们计算过，只要我们集中三个军以上的精锐部

队，就能搞掉胡宗南！”

王树声、王宏坤、何畏、程世才等军级干部都表态赞同：“如果能够搞掉胡宗南，我军就能获得一批自动步枪、火炮，装备会大大加强，弹药也能得到很大补充。”

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平时对军事问题很少发言，这时也忍不住插话道：“有了新根据地，既能解决部队衣食住行等问题，又能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现在筹措粮食太难了，几乎到了与民争食的地步。”

“还可以支援中央红军的长征。”张国焘冷不防插了一句。

听到这话，会场顿时寂静下来。

张国焘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份电文，在空中扬了扬：“刚接到中央通报。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受挫，正在向西进行战略转移，他们需要全国红军的战略支援。”

这个消息令红四方面军将领非常意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

清江渡一致通过了徐向前关于经营川陕甘的战略计划。

接着，会议用三天时间举办了高级干部训练班，由徐向前讲授战役战术的应用，包括集中兵力、进攻突破、运动防御、迂回包围等。

会后，部队进行整编。

这次整编与木门整编完全不同。那次是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胜利，苏区人口充盈，部队由4万人扩编为8万人；这次反“六路围攻”的战果更大，但部队人数由8万人减少到6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已经被抽调干净，无兵可补，只能对现有部队进行缩编。方面军由原来的15个师缩编为11个师，其中：四军辖十、十一师7个团；九军辖二十五、二十七师6个团；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9个团；三十一军辖九十一、九十三师6个团；三十三军辖九十八、九十九师4个团。另外，方面军的炮兵扩编为炮兵团，彭杨干部学校改为红军大学，妇女独立团保留原建制。

缩编后，李先念、程世才统领的红三十军成为方面军中人数最多的军。

二

广昭战役是两位黄埔同窗间的对决。徐向前与丁德隆打成平手。这次不起眼的战役，起到了改变军事走向的作用。战后，丁德隆升为师长，一年后他被另一位黄埔同窗左权打败，削职为民。成也同学，败也同学，这是多数出身黄埔的国民党将领的宿命。

1934年的冬季特别寒冷，比风雪更寒心的是消息。

中央红军撤离江西的消息，令人震惊。红四方面军开动所有电台，集中力量截收、破译国民党电报，将有用的信息提供给中央，同时也急切地收集着中央红军的行动路线和沿途战况。

一有消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便凑到一起分析、揣测和讨论。因为战况不好，不便跟下面的人讲，只好三个人自己着急、郁闷、上火。按照徐向前的话来说：“中央的命运，谁不关心呀！”

1935年1月，电台收到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的通报，通报中有关于取消博古、李德最高军事领导权、选举毛泽东进中央政治局任常委、张闻天（洛甫）接替博古（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的决定。张国焘敏感地意识到，中央领导机构改组了，改朝换代了；毛泽东不仅重新出山了，而且在党内和军队的地位空前提高。同时，他还产生了一个疑问：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未过半数的情况下选举和更换总书记和常委，这种选举结果有效吗？由于得到的只是关于遵义会议的简略情报通报，未得到正式文件和详细内容，他把这个疑问按了下去。

不久，中央发来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派一个师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总部首长和军级干部商议策应问题。

张国焘没有把握：“派出一个师，能起到策应的作用吗？”

“肯定不行。”徐向前说，“四川这种地形，敌人只要把山险隘道截断，你就无处可走。派一个师出去，少了，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的，无回的。”

张国焘为难了：“部队派多了，根据地难守。要不，只好大搬家。”

陈昌浩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敌人报纸上讲，徐海东已经率领红二十五军打到了陕南豫西，按方向和路线，好像是在寻找我们，也需要派一部分人马接应。”

有人提出：“既然两边都要人马接应，就先派一个团去。”

张国焘气不打一处来：“蠢嘛！一个师都不够，一个团哪能行啊。”

徐向前思前想后，提出意见：“现在情况都不明朗。我看，还是按清江渡确定的军事方针办，先拿下广元、昭化，消灭胡宗南刚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如果能够一举拿下广昭地区，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可图谋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也可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

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最后确定先进行广昭战役。

广元、昭化原本是川军的地盘。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四川军阀始终以“川人治川”为口号，拒绝蒋介石的中央军以“追剿”“助剿”“会剿”的名义进入川境。这个禁忌在“六路围攻”失败后被打破。国民党中央驻川代表程泽明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建议中央军火速入境：

万源作战仅过半月，赤匪便收复全部失地，嘉陵江东岸均被占领，东北之城口、西北之广元还延伸数百里。四川各军均遭惨重失败：田颂尧二十九军几乎全军覆灭，罗泽洲、李家钰部大部被歼，二十三军溃不成军，邓锡侯元气大伤，刘湘、杨森之精锐损失殆尽……川军将领均垂头丧气，互相责难，已无战斗力可言，川军已不足以担任剿匪之大责任，四川的剿匪军事已到不得不由中央来统筹指挥的地步。

不仅环伺在川境四周的中央军急于入川，屡战屡败的各路川军出于自保，也纷纷向中央军发出了求援的呼声。最早伸出乞援之手的是第二十八军军长、盘踞川西北的邓锡侯。

邓锡侯（1889—1964），号晋康，四川营山人，人称“水晶猴”。这个绰号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遇事通透、机灵，善于审时度势，有褒的成分；二是说他处事圆滑，会钻空子。在军阀混战中，邓锡侯时而作壁上观，时而充当调停使者；时而左右逢源、取渔翁之利，时而拍屁股走人、溜之大吉。他每次参战都是损失小、得利大。有人就此写诗讽刺道：

君侯不愧号水晶，
半用调停半用兵，
刀打豆腐光两面，
输也吃糖何况赢。

八面玲珑的邓锡侯在“六路围攻”中吃了大亏，兵力折损大半。他愤怒地质问部下：“你们进攻了几个月，才打到小通河，但是撤退时，几天就跑回来了。你们一趟子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我不怪士兵，但要问一问这些指挥官究竟

在干什么？”

为了固守川西北防区，邓锡侯亲往甘肃天水，拜访胡宗南，请他率部入川助剿。胡宗南欣然应允，派出五个团和两个游击支队进入广元、昭化地区，统属独立旅旅长丁德隆指挥。其兵力部署为：独立旅旅部和第一、第三团驻广元，第二团驻昭化，附属该旅的第一旅第一团和补充旅第一团，位于广元以西的羊模坝、三磊坝一线，两个游击支队活动于川陕交界的转斗铺等地，保证广元、昭化腹背安全。

对于丁德隆，徐向前并不陌生。他们同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在鄂豫皖苏区交过手。他了解这位老同学谨慎持重的用兵风格。

丁德隆独立旅是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典型的黄埔系，所有的团长、营长，直至连、排长都是清一色的黄埔生。该部装备精良，平时训练严格，作风硬朗，战斗力强悍，气焰嚣张，自称“天下第一军”。丁德隆善于守堡，长于防守反击，习惯将主力置于核心阵地，而以战斗力较弱的部队布防于外线，等敌攻破外线、兵力渐钝时将主力投入反击，一击制胜。

徐向前观察广元、昭化地区的布阵，发现丁德隆有两处别致的地方：一是他布防于羊模坝的部队为补充旅第一团，此团多为新兵；二是广元城外城隍庙的守军是第一旅第一团，该团不属于独立旅本部编制。这两处，均为广昭的外围据点，丁德隆安排配属给他指挥的友邻部队驻守，显然有保存实力和伺机反击的意图。

1月22日，广昭战役打响。红九十一师和十师先以部分兵力沿川陕大道直扑转斗铺，另以一部经黄坝河，迂回在转斗铺左侧，两军歼灭胡宗南第一游击大队大部，而后伏击前来支援的第二游击支队，再次取胜，迫使溃敌逃回原驻地得胜关，解除了大部队渡江的侧翼威胁。

当晚，徐向前亲率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共9个团从广元城以北的朝天驿架设浮桥渡过嘉陵江，23日直趋羊模坝，包围补充旅第一团。这个团虽由新兵组成，但是该团团长罗克传久历兵戎，作战经验丰富，他命令团部与二、三营互为犄角，利用山头、据点与壕沟，组成交叉火力网，顽强抵抗。

胡宗南部队的战斗力在羊模坝得到充分体现。罗克传团凭借有利地形和强大火力，硬是在九个团的围攻下，坚持了一天一夜。罗团构建的多层阵地逐一被夺，伤亡殆尽，仍死战不溃，退守到最后一个山头顽抗。总部炮兵团发射的最后一发炮弹，正好击中山头主阵地，步兵乘机发起冲锋，这才解决战斗。

徐向前非常意外，他以九倍的兵力围攻一个新兵团，竟然打了一天一夜，还牺牲了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中两位猛将。

红军主力足足休整了3天，于26日向广元发起进攻。

广元县城坐落在嘉陵江畔，因地势险要、四季风大又被称为“风城”。广元城内由独立旅旅部和该旅第一团团长张灵甫防守；城外有两处要地，城东高地为城隍庙，由第一旅第一团李正先部驻守；城西高地为九龙山，山势雄伟，绵延拱卫着大半个城，其主阵地乌龙堡居高临下，筑有由内向外的五大堡垒圈，由独立旅第三团驻守。

红军兵分两路，以红十师3个团攻击城东城隍庙，以红八十八师和红九十三师攻击城西九龙山。战斗进行得非常惨烈，几乎是寸土必争，步步喋血。独立旅战报称：“东西剧战，彻夜不息，我五（九）龙堡守军死力坚守，肉搏奋斗，阵地屡得屡失，进退往返数十次。”^①

战线首先在城东出现动摇。防守城隍庙的第一旅第一团团长李正先遇到红军3个团的攻击，兵力损耗严重，请求丁德隆派兵增援。丁德隆不仅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反而下令撤掉从城东通往城内的浮桥，美其名曰“坚定其背水一战之决心”。

27日，李先念率三十军主力架设浮桥，抢渡嘉陵江成功，攻占广元飞机场，加入城西战斗，经两天激战，攻占乌龙堡外围的8个山头阵地。29日，红军集中九十三师和八十八师“夜老虎团”夜袭乌龙堡，红十师也在城东发起总攻。进攻乌龙堡的部队连破敌人五大圈堡中的四道圈堡，使敌处于全线动摇之势。

危急时刻，丁德隆一度打算弃守广元城，被一团团长张灵甫劝止。

“旅座放心，职部担保广元无忧。”张灵甫分析道，“红军在广元城外围已经激战一周，每攻破一道防线都要脱层皮，即使他们能够突破层层防线攻到城下，也无法再突破我第一团预设的三道堡垒。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撤围。”

丁德隆半信半疑，再次下令撤掉城西通往城内的桥梁，令第三团死守乌龙堡，人在堡在，堡亡人亡^②。

战局的发展证实了张灵甫的判断。1月29日，徐向前下令撤军，结束广昭战役。他这样解释撤军缘由：“广昭战役，我们和敌人打了平手，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原因是胡敌装备好，战斗力强，凭险固守，我军缺乏炮火，硬啃啃不动。羊模坝一仗，追击不力，失去了野外歼敌的战机，这同我们对敌情、地形的了解不够有关。”

丁德隆经过广昭战役对红四方面军产生蔑视心理，他在战报中认为：“匪军连年窜扰，损伤颇多，初级干部能力低劣，子弹尤感缺乏。故其攻击动作都在夜

①《第一师广元、昭化战斗详报》（1935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

②王应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间，攻击时全用红灯，以密集队伍利用隐蔽及交通便利之处向我攻击。夺其山头若不得逞，即行溃败。”他给胡宗南和第一师官兵的建议是：

“匪来时沉着应战，匪必自溃败也。”^①

此役，丁德隆以寡敌众，与徐向前打成平手，不久晋升为师长。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在陕北又遇上了另外一位黄埔同窗——左权，在山城堡战役中被打得大败，受到撤职的处分。

成也同学，败也同学。这是多数出身黄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宿命。

广昭战役的真正意义，参战的第一师和独立旅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战报中连打死的两位红军高级将领的姓名都没有弄清楚，第一师参谋长于达认为在广昭战役中击毙了“蔡申熙”，丁德隆则认为击毙的匪首是“陈昌浩”和“董麻花”。

多年后，历史学者认为，丁德隆固守广昭成功，使徐向前清楚地认识到，胡宗南的第一师在装备、素质、地形与态势上均占据优势，红军向甘肃进军战略规划暂时还不能成为现实；而张国焘听闻胡宗南的部队战斗力如此之强，对北上陕甘心存畏惧，这也是日后他始终畏惧北上的原因之一。

对于蒋介石和胡宗南来说，广昭战役不止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北进的战略规划，更重要的是，被红四方面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的四川军阀见识到了中央军的威力，加速了四川各派军阀归顺南京政府的速度^②。

三

王劲哉自视甚高，扬言中国只有三个半英雄，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汪精卫，半个是王劲哉。顷刻之间，他的老虎旅被红军“夜老虎团”吃得精光。红军虽然干掉了陕军头牌劲旅，但背上了背弃盟约的名声。杨虎城感叹：“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攻打我汉中？”徐向前一再辩白：“我真的不是真打。”

广昭战役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收到中央和军委的紧急电报：

①《第一师广元、昭化战斗详报》（1935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

②钟子麟：《张灵甫》，团结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第56页。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

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江，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也是有利的。

故你们宜迅速集结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敌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①

这封标有4个“A”的电文，具有一些关键性的信息，特别是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央红军已经明确了入川的总体战略和行动方向；

二是中央和军委对红四方面军的要求已从间接的战略配合转为直接的战略配合；

三是中央对川陕根据地确定了东防西攻的决策，即以群众武装和独立师团在东线钳制刘湘，集中全力向嘉陵江西岸发展。

张国焘立即电令远在广昭前线的徐向前返回后方。西北军事委员会在苍溪坝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执行中央电令。

张国焘脸色凝重：“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这就意味着我们又将来次西征，红军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艰难，中央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此，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大事。”

会议集中讨论了是否以主力南下，直接与中央红军打通？走哪条道路？需要多少兵力？能不能打到长江边等问题？

讨论的结果是否决了马上从苍溪、阆中、南部对进的方案。主要原因是苍溪、阆中、南部一带正处嘉陵江中游，江阔水深，对岸沿江及纵深地带邓锡侯、田颂尧两军几十个团筑垒防守，红军缺少渡江船只。

^①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红四方面军电》，1935年1月23日。

首倡西进嘉陵江战略的李先念一直在搜集渡江资料。他提出至少要有一两个月的准备：“我研究过嘉陵江的水文资料，最好的渡江地点在昭化以北，那里江窄、水缓、滩浅，对岸防守兵力单薄，但是，过江之后要面临剑门关之险，南下非常困难；昭化以南江宽、水急、滩深，对岸有强兵把守，如果不进行充分准备，贸然过江，很难成功。”

会议做出决定：1. 暂时停止在甘肃南部与胡宗南角逐。2. 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搜集造船器材，隐蔽造船，解决渡江工具，勘察渡江地点；3. 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4. 即以主力一部突击陕南，调动沿江兵力北上，为在苍溪、阆中一带渡江创造条件。

会后，三巨头进行分工，张国焘负责准备渡江事宜，陈昌浩负责对付东线川敌，徐向前负责率军突击陕南。

突击陕南的主要对手是盟友孙蔚如的第十七师。红四方面军所以违约出手惩戒，表面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在“六路围攻”期间，陕军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出兵攻打红军。二是任凭胡宗南的势力伸向川陕边，威胁红军侧背。

杨虎城和孙蔚如对这两条指责，觉得难以理解。从缔结巴中协议到红军突击陕南，孙蔚如部在事实上做到了不做实质性进攻，这也是红军能够在反“六路围攻”中只用两个团的兵力警戒巴山北麓、集中兵力对付川敌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因素之一，至于小规模的前哨战斗，那是做给蒋介石看的，是必需的，这点早就写在协议里了，不能把虚张声势的出兵或零星的前哨战斗视为背约。胡宗南部伸入川北，主要是防守川西北的邓锡侯邀请的结果，与孙部无关，即使孙部有意抵制，也鞭长莫及。

出兵陕南的真正原因，还是徐向前所说的“出于战略上的需要”，“顺便给孙蔚如点颜色看看”^①。

2月上旬，徐向前率12个团闪击陕西南部，攻占川陕门户宁强，消灭守敌一个团，然后从宁强向东北挺进。孙蔚如急调第四十九旅和独立旅一团，由勉县向西迎击。双方打出火气来的一仗是“夜老虎团”硬碰“老虎旅”。

第四十九旅是陕军头牌劲旅，该旅系甲等编制，齐装满员，素以善战著称，旅长王劲哉凶悍、骁勇，人称“王老虎”。他率领的四十九旅在历次军阀混战中罕遇敌手，所向披靡。王劲哉自视甚高，扬言中国只有“三个半英雄”，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汪精卫，半个是王劲哉。

首先与四十九旅交手的是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

^①《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第314页。